

#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活跃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实习记者 张寒梅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联合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241.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13年至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达到1640亿美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中国企业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于津平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领域分布广泛,企业数量众多。其中重点投资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印尼、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老挝等东盟国家。

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涉及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沿线设立企业超过1.1万家,约占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数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制造业投资占比不断提高,占总投资近四成,增速为22.8%。

“对沿线国家制造业领域投资加大,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结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中国制造业体系日趋完善,对原材料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需求相应增加。同时,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后,可以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通过生产环节转移或产业链延伸,形成更强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投资增长带来了互利共赢的局面。以扩大就业为例,2021年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企业雇用外方员工超过了58万人。于津平说,中国投资助力沿线国家扩大了就业、推动了工业化、提升了贸易竞争力,为其经济发展注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李增刚表示,除了显著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降低其贫困深度和强度、带动其经济增长速度以外,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也使中国获益。一方面,中国可以把生产环节转移到沿线国家,为高附加值行业的发展腾出了空间;另一方面,有效提高了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增加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

由于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面临诸多挑战。于津平说,受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全球化逆流的影响,“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沿线国家间关系和部分国家对华政策存在较大不稳定性。此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汇率大幅波动也在冲击沿线国家经济,为中国对外投资带来挑战。

“除此之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还面临着多方面其他可能增加的成本。”李增刚认为,部分沿线国家产权制度不完善可能为中国企业带来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契约得不到有效执行等问题;金融制度不完善可能对投资收益的兑现造成风险;宗教情况复杂以及语言种类众多则增加了沟通交流的成本。

尽管如此,中企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依然拥有良好的发展机遇。李增刚表示,从经贸关系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关系密切,是很多沿线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从产业基础看,中国和沿线国家存在很强的产业互补性,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理想的投资目的地;从经济实力看,沿线很多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有

较强烈的经济发展愿望,其积极吸引外资的战略举措,给中国企业提供了较大的投资空间。

于津平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国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也为企业对外投资投资注入了动力。“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沿线国家推行利用外资发展战略,市场开放度不断提高,享受发达国家的贸易特惠政策,投资的区位优势越来越明显。”

“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情况稳中向好,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屠新泉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数量多,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存在良好的人口红利基础。当前,其经济发展还处于较“年轻”的状态,前景广阔。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国际投资,首先要熟悉当地市场和营商环境,对自身优劣势进行清晰定位;其次要培养国际经营人才或在当地寻找优秀合作伙伴,继续发挥在对外投资中学习能力强、适应能力强的优势,规避风险,抢抓机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为庆祝法语国家及国际组织(OIF)成立50周年,第十八届法语国家组织峰会将于11月19日至20日在突尼斯举行。值此会议前夕,全球化智库(CCG)与突尼斯驻华使馆、法语国家驻华大使主席团(GAF)在11月14日联合举办“法语国家及国际组织和中国:数字化发展与合作,打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大使圆桌活动。

当天,来自多个法语国家的驻华使节与中国专家学者就新形势下全球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议题进行了交流。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中国与法语国家在数字化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对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有望发挥重要作用。

突尼斯驻华使节团办穆斯塔法·阿比德在致辞中表示,法语国家组织是一个由88个国家和实体组成的国际组织,其成员数量仅次于联合国,在世界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或者文化社区,还是一个将不同的国家与实体联接起来的共同体。作为一个以法语为桥梁团结起来的国际组织,法语国家组织渴望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科学、社会层面紧密相联,并同中国在数字化方面形成协同化发展。

加蓬共和国驻华大使、法语国家组织驻华使团轮值主席波德莱尔·恩东·埃拉认为,法语和法语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中国是法语国家和地区首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对共同促进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法国驻华大使罗梁强调,在当前全球多重挑战叠加的背景下,法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希望通过数字化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数字化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因素之一,也是法语国家组织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希望促进法语国家同中国开展合作,进而促进全世界的协同发展。”

瑞士驻华大使白瑞宣表示,数字化治理涉及到各个领域,也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利工具。为了给数字化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国家不应该采取过于严苛的管理模式,而是要创造一个安全、自由、开放的网络空间。白瑞宣肯定了在中国在网络制度建设方面的积极举措,并希望中国和法语国家能在数字化合作方面更进一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永升表示,中国数字化率居世界首位,在数字化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在数字化合作方面,中法两国可以优势互补。中国有庞大的网民基数和市场,法国也有很大的数字服务需求量,因此在这一领域双方的合作前景值得期待。

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认为,数字化的发展跟语言密切相关,在人群中,法语正在成为继中文、英文之后第三重要的语言。中国人民和法语国家人民有着良好的交往基础,也愿意同法语国家一道,寻找共同合作的方式。“在未来数字化发展的过程中,中文用户和法语用户会成为世界数字化的重要推动力。”

据了解,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是成员语文化为基础的联盟,目前有54个成员国和地区、7个准成员国和地区、27个观察员国和地区,致力于促进法语和文化及语言多样性,促进和平、民主和人权,支持教育和研究发展合作。

## 法语国家驻华使节看好对华数字化合作广阔前景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 硕腾中国加码投资2亿美元

本报讯 11月15日,硕腾中国生物制药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在苏州工业园区正式开业。此次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项目投资超2亿美元,专注于针对畜禽、水产及宠物疫苗的研发与生产。

硕腾全球CEO Kristin Peck通过视频致辞时表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市场之一,蕴含巨大潜能,且具备独特的市场环境。硕腾中国生物制药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在苏州的落成是集团持续投资于人才和本地创新的有力证明,同时展示了研产销一体化的协同作用,将为硕腾未来在中国的增长再添强劲动力。

据了解,新建的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包含疫苗制造和研发两大业务板块,通过研发、生产一站式布局,助力硕腾全球研发总部的专业知识与中国本地研发技术资源整合,为新产品架起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产的“桥梁”,加速产品上市,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硕腾中国生物制药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的启用是硕腾在苏州园区投资发展以来的重要里程碑,也是硕腾‘立足中国、服务中国’长期策略的重要实践。”工厂厂长、总经理吴久发表表示,新工厂将成为硕腾在中国最大的设施,进一步扩展公司能力与产能,提供高质量的动物疫苗。未来,硕腾还将持续致力于本土产品创新、制造技术升级和工艺改进,加速全球多元化创新产品进入中国,进一步满足本土市场需求,赋能中国动物保健医疗行业发展。

多年来,苏州工业园将生物医药作为着力培育的重点产业,聚焦新药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及新型疗法等重点领域,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做大做强,2021年实现产值1177亿元,生物医药产业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苏州工业园供稿)

## 投资环境

### 全球企业业绩连续两个季度恶化

《日本经济新闻》日前报道称,全球企业收入恶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报道在汇总了日本、美国、欧洲、中国和其他地区约4700家上市公司的业绩后发现,7月至9月期间他们的总净利润下降了3%,约为8702亿美元。此前,4月至6月期间的利润下降了10%。这是两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季度的利润下降。这主要是各国的加息和市场情绪恶化让全球商业急刹车,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下迅速扩张的金融和IT企业受影响较大。

### 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再创历史新高

据新华社报道,日本央行近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进口商品价格持续飙升叠加日元大幅贬值,日本企业物价指数连续20个月同比上涨,10月同比上升9.1%至117.5,再创有统计以来的新高。报告显示,当月对企业物价上涨推动作用最大的是电力、管道煤气和自来水价格,同比上涨43.2%。此外,矿产和钢铁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7.5%和22.4%。企业物价指数显示企业间就商品及服务进行交易时的价格水平。专家表示,由于难以通过提价向下游转嫁成本上升压力,多数企业经营空间受到挤压。(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 中国高铁在合作开放中走向世界

■ 本报记者 张凡 实习记者 马晓玥



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印尼员工近日在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雅万高铁资源管理中心学习中国标准“筒统化”接触网零部件装配工艺。

新华社发 焦宏涛 摄

11月15日至16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印尼政府在会上首次展示雅万高铁的建设成果。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隆,是印尼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第一条高速铁路。项目建成后,两端车程将由原来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约40分钟。

该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高铁从技术标准、勘察设计、工程施工、装备制造,到物资供应、运营管理和人才培养等全方位“走出去”的“第一单”。

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姚为群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尼政府在G20峰会上展示雅万高铁释放了两点信号:一方面,中国和印尼同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共同利益广泛,合作空间广阔。此次雅万高铁合作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与合作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典范。另一方面,在G20这样的国际一流会议上,由印

尼来展示雅万高铁,无疑是对中国高铁技术的一次全球性宣传。雅万高铁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展示雅万高铁也表明了印尼政府愿意与中国一道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雅万高铁的开通,给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带来了更多可能。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部副研究员张玉静认为,印尼将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采购机会。印尼政府计划在2024年之前,投入总金额437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印尼作为中国在东盟的前三大工程承包市场,雅万高铁的开通进一步增强了印尼对中国企业的信心,未来中国企业在印尼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将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

同时,雅万高铁的成果提升了东盟国家对中国产品的信心,从而推动中国和东盟国家进行更紧密的经贸合作。“雅万高铁不仅能够为中国产品、中国建设在当地民众心中赢得良好口碑,而且高铁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也能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在

印尼甚至东盟地区深入人心。”张玉静说。

对于如何继续推广中国高铁“走出去”,张玉静表示,主要可以从三个方向发力:一是支持中国高铁企业与国际铁路联盟开展战略合作,鼓励我国企业高端技术人才“走出去”,前往国际铁路联盟总部进行联合培养和实践培训,实现铁路标准的沟通和交流。二是加强对中国标准的宣传工作,推进中国高铁技术标准外文版本的翻译工作,让更多国家、更多企业的企业以及专业人才更了解中国标准。三是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标准机构合作,构建贸易促进机构和国家标准机构务实合作的高效协同机制,推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铁路标准的互联互通。

近年来,中国高铁凭借技术先进、安全可靠、性价比高、兼容性好、运营经验丰富、建设运营适应性强等优势,出口海外。姚为群认为,以雅万高铁为代表的中国高铁在合作开放中走向世界,展现“中国建造”和“中国技术”,助力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相互交融、相互成就。

# 抹黑“一带一路”不如共建复苏之路

■ 梁海明 冯达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9年来,已经成为深受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然而近年来却不时传出“一带一路”项目让沿线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的言论,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实际上,这些言论从未有研究证实,多是一些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政治学者、政府高官、智库和媒体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结果。例如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1月在《世界报》发表文章,宣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债务陷阱外交”,抛出了“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他们在国际上持续渲染中国利用不透明的贷款条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融资,在后者无力偿还债务时,获取其军事或战略资源。

这些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受到了各方有力的驳斥。除了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学者之外,多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领导人和官方人物均在不同场合公开驳斥“中国债务陷阱论”错误言论。部分美国学者、美国智库也依据研究数据发表过不少驳斥“中国债务陷阱论”的报告。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黛博拉·布劳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列举了黑山、肯尼亚、赞比亚和其他地方的案例,表示有西方媒体大肆宣扬“债务陷阱论”,却没有证据支持。又如,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铁路联通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增长2.8%。其他研究还发现,“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可使当地物流时间平均缩短1.2%至2.5%,令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1%至2.2%,使全球实际收入增长0.7%至2.9%。这都说明,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正向经济效应。

笔者也曾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进行过详细的研究,除了得出“一带一路”项目是“馅饼”而非“陷阱”的结论外,还发现了四个有趣的现象:

其一,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的沿线国家政界人物最终选择加强与国际合作。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在野党为了赢得选举,将有关“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当作政坛博弈工具,借中国贷款问题向政治对手发难,以此获取选票赢得大选。但那些在野党上台之后,犹如川剧变脸般迅速向中国贷款和吸引中国投资,类似情况曾先后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府变更中出现过。

其二,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注重长期经济收益。与不少西方国家政党频繁轮替,新政府上台之后对原政府签署对外协议不予承认相比,中国政府对沿线国家的合作承诺无疑是长久的、统一的,且更能够获得沿线国家的信心。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回报周期长,短期内较难盈利,因此中国投资更注重双方的长期经济收益。例如,据印尼官方预计,由中国在印尼投资兴建、造价约80亿美元的雅万高铁,在未来40年可创造超过231亿美元的收益,不仅中国与印尼双方获得的回报将远高于投资成本,而且中国政府还与印尼展开多领域的合作,中国与印尼的经贸关系持续深化。

其三,债务国家向中国贷款修建基础设施,长远是为了向西方还债。目前,“一带一路”项目投资的约70%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所以向中国贷款修建基础设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发展经济以偿还西方国家、多边金融机构此前的债务。当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被欧美国家和商业银行拒之门外时,是中国对他们伸出援手,并提供中国技术、中国

标准协助他们建设基础设施,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和政府税收增加,才会让该国政府有更多的资金去偿还西方国家、多边金融机构的外债和推动国内社会民生发展。

其四,美联储持续大幅度加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沿线国家的债务管理和治理才是真正的挑战。美联储近期激进加息,令有较高美元债务存量的沿线国家出现债务危机,且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各国经济普遍下滑,财政收入减少,加重了其债务负担,部分国家甚至还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时却还要偿还外债,压力巨大。

公开数据显示,许多存在债务风险的沿线国家的债权人非常多元,包括欧美国家、日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中国并非出现债务风险国家的唯一债权人和主要债权人。因此,部分西方国家与其指责中国进行“债务陷阱外交”,不如将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债务国家应对债务问题的能力,加强各国在国际债务治理上的磋商合作,为各国解决债务问题提供系统性、综合性的方案,以协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复苏,提升其发展能力。(作者分别系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名誉院长)